

梁發在澳門、廣東傳播 基督教新教及其思想文化效應

黃啟臣*

1807年9月，基督教新教英籍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到廣州，1808年前往澳門傳教。1810年又來廣州傳教，請印刷工人梁發將其翻譯成中文的《新約》雕刻印刷發行。梁發受影響於1816年11月受洗成為教徒。從此，梁發經常來往於廣州、澳門、高明、開平、高州以至南洋地區，廣為傳教，對廣東乃至中國產生了廣泛的思想文化效應。其具體表現在：激發洪秀全掀起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推動廣東近代新式學校教育的興起；加速廣東建立近代西醫藥體系等。

19世紀初，基督教新教(以下簡稱基督新教)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教士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澳門傳播基督新教，現屬江門市的高明縣人梁發極力協助馬禮遜，後來自己終身在澳門、廣州、高明、開平、陽江等地傳播基督新教，並產生廣泛的思想文化效應。本文擬就此專題作一探求。

馬禮遜等來澳門傳播基督新教

在荷蘭殖民者侵佔臺灣時，基督新教曾於1626年派遣傳教士到臺灣傳教，吸收上千人入教。1662年，鄭成功把荷蘭殖民者趕出臺灣後，基督新教在臺灣的活動也隨之消滅了；以後還進

行過幾次嘗試來中國傳教，但始終未能實現。

18世紀末，英國在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等國競爭中奪得了海上霸權，並竭力向海外擴張殖民地。為了適應擴張的需要，在英國國內紛紛成立對外傳教的基督新教的差會機構。1795年成立“倫敦差會”(差會即傳道會)，1796年成立蘇格蘭差會，1800年成立基督會差會。這些差會訓練了一批傳教士，陸續派往亞洲、非洲國家傳教。19世紀初，基督新教有卡萊(Carey)、麥西門(Marshman)、和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等三教士極力主張到中國傳教。最後，“倫敦傳道會”(即倫敦差會)選中了馬禮遜。

羅伯特·馬禮遜，英國人，1781年生於大不列顛島北部莫佩斯小鎮的一戶農民家庭。從

*黃啟臣，1938年1月生於廣西靈山縣，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館館員；曾任中山大學法政學院副院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中國明史學會、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等十六個學會的理事和顧問、中國商業史學會對外貿易分會副會長、廣東中國經濟史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顧問；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應邀到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港、澳、臺等國家和地區訪問和講學，並被聘為日本大阪大學、關西大學客座教授；應邀為華盛頓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多倫多大學、渥太華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麥吉大學、神奈川大學、神戶大學、吉備國際大學和廣島大學訪問教授；已出版《十四—十七世紀中國鋼鐵生產史》、《澳門通史》、《明清廣東商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梁經國天寶行史跡》等二十六本著作(含合著)；發表〈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等論文190多篇；小傳被列入 *Who's Who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和《世界名人大辭典》等十多部辭典中。

小受宗教思想薰陶，學會拉丁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後考入倫敦霍克斯頓神學院，又轉入高斯坡神學院。1804年加入倫敦傳道會，1807年1月8日被封為牧師。當倫敦傳道會選中他來中國傳教時，便開始學習中國文學，請了一位名叫楊善達的廣東人做教師，並在倫敦博物院裡找來一本有中文的《新約》，天天抄寫中文，後來成為他翻譯《聖經》的草本。馬禮遜是倫敦傳道會派遣的，但當時壟斷中國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怕影響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不允許傳教士乘坐公司的商船前來。於是，馬禮遜祇好於1807年1月31日啟程，先到紐約，得到美國國務卿麥迪森(James Madison)的協助，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駐廣州的美國商館的官員。他帶着介紹信於1807年5月19日在紐約乘坐“三叉戟”號美國貨輪橫跨太平洋，於9月8日抵達廣州。他受到美領事卡林頓(Carrington)的熱情接待，隱居在一間美國商館的貨棧裡，繼續學習中文，並在生活起居上做倣中國人的生活習慣。

1808年，他從廣州前往澳門居住。為了避免給澳門葡萄牙當局發現他的正式身份，他隱居在英國駐澳門的東印度公司內，從而認識了該公司一位高級職員的女兒瑪麗·摩登(Modong)小姐，並產生愛情，遂於1809年結了婚。他的處境得到東印度公司的同情，決定聘他擔任公司的中文翻譯，年薪五百英鎊。這樣一來，他既可以為東印度公司服務，取得合法身份出來公開活動，又免去被中國政府驅逐的擔心，大膽地進行傳教工作。從此，他一邊辦公，一邊翻譯《聖經》，經常來往於澳門和廣州之間，並以英國使臣、商務監督律勞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的“秘書兼譯員”的身份在澳開始基督新教的



馬禮遜像

傳教活動。這是基督新教傳入澳門(也是傳入中國)之始。當時澳門天主教會禁止教徒同馬禮遜來往，所以他平時就在廣州自己的寓所裡舉行家庭禮拜，每逢星期天才到澳門舉行正式的禮拜儀式。他一個人在澳門與廣州進行傳教工作六年之後，倫敦傳道會才於1813年派教士米伶(William Milne)來澳門協助馬氏工作。但因受清朝官府和東印度公司之反對，米令即於1815年4月17日到麻六甲去另設基地進行傳教活動。

為了便於傳教，馬禮遜首先把《聖經》新約全書譯為中文，於1814年在廣州出版兩百本；接着又和米伶合譯了《聖經》舊約全書，於1823年在麻六甲正式出版。於是，基督新教的全部原始教義得



梁發像

以在澳門及廣州傳播，馬禮遜當是第一人。他還編輯《神道論》、《救贖救世總說真本》、《問答淺註耶穌教法》、《古時如氏亞國(即猶太國)歷代傳略》、《養心神詩》等佈道的小冊子，請澳門的印刷工人蔡高(亦稱蔡亞高)幫助刻印發行。蔡高因為經常要到馬禮遜家中去聯繫工作而聽其講《聖經》，深受影響，請求入教。於是，馬禮遜即於1814年7月16日，在澳門海濱的小山山側的泉水中為之洗禮入教，成為澳門(也是中國)信仰基督新教的第一個教徒。另一個幫助馬禮遜刻書傳教的是在澳門做印刷工人的高明縣人梁發。

由於馬禮遜在廣東傳播基督新教打開了局面，於是美國、荷蘭、英國等國家的基督新教

會不斷派教士前來廣東傳教。1830年2月25日美國的美部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派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到廣州、1831年12月荷蘭教會派遣德籍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到澳門、1833年10月26日美部會又派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到廣州、1834年10月26日又派遣精通醫術的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到廣州、1835年7月21日派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來廣州、1836年9月派叔未士(J. Lewis Shuck)來廣州和澳門、1837年5月派羅孝全(Issachar Jacax Roberts)到澳門和廣州，等等。這些傳教士同樣得到梁發的全力幫助並一起開展傳教活動。⁽¹⁾

梁發不遺餘力傳播基督新教

梁發於乾隆五十三年(1789)出生於廣州府屬下的高明縣三洲司古勞村的貧農家庭，十一歲才入私塾讀書。按中國私塾的規例，他先讀《三字經》，後讀《四書》、《五經》，共讀四年，算是對中國儒家典籍有相當的基礎。梁發到十五歲時，家裡再無法供他讀書，於是他到省城廣州打工謀生。開始時他在一家筆店學習製筆，後改學雕版刻字四年，掌握了刻字技術，並努力學習文學。嘉慶十五年(1810)，梁發結束學徒生活成為一名正式的雕版工人。在廣州十三行附近的一個印刷廠做工。此時馬禮遜已在廣州傳教。1811-1812年，他把《路加福音》和《新約》兩書翻譯為中文，請梁發雕刻和印刷，從此與馬禮遜結下不解之緣，並終生全力和馬禮遜等外國教士在廣東傳播基督新教。

梁發又為馬禮遜刻印《聖經》中譯本，與馬禮遜的關係更加密切了。1815年，另外一位來廣東傳教的倫敦會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被馬禮

遜派往麻六甲傳教，梁發應馬禮遜要求，跟隨米憐前去協助刻印中文書籍資料，並成為米憐的助手。⁽²⁾此時，梁發對基督新教產生強烈的興趣和要求，於是米憐於1816年11月3日給梁發施洗成為基督新教徒。從此，梁發在米憐的刻意培養下，以中國本土基督新教徒的身分在廣東傳教中發揮了外國傳教士難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1818年以後，梁發經常往來於廣州、澳門、高明、開平、高州和南洋之間，為傳播基督新教而奔波勞碌一生。

1819年4月，梁發乘船從麻六甲回到廣州，然後回家鄉高明，在他父母的敦促下完了婚。於是，他就在本鄉積極傳教，先是編寫《救世錄撮要略解》一書，並附〈經文〉數段、〈禱文〉數篇、《聖詩》三首和〈十誡〉，帶到廣州給馬禮遜審閱後刻印二百份，分發贈送親友宣傳。後被高明縣署發覺，梁發被捕入獄。好在馬禮遜向有錢的商人極力斡旋，出了罰金，並具結以後永遠不在廣州傳教，始獲釋放，後回家與家人團聚四十天。

1820年春，梁發又重去馬六甲說服米憐。不久，因他妻子黎氏要生孩子，他祇好又回到高明家裡侍候。其間，他不斷向其妻讀經祈禱，後來其妻果然亦信奉基督新教，於是他在家裡的一個陋室中舉行聖禮，用飯碗代替洗禮盆，為他妻施洗入教。

1821年，梁發夫婦告別家鄉又去麻六甲幫助米憐傳教。可惜1822年米憐患肺結核病亡。梁發重回高明。次年，他攜兒子進德到澳門在馬禮遜面前求洗入教。

1823年，馬禮遜回國，在啟程前將梁發封立為宣教師(Evangelist)。1826年，馬禮遜再到廣州，直至去世(1834)。梁發一直充當他的助手在廣東傳教。

1828年9月26日，梁發從廣州回到家，不久，他發現幼年讀私塾的同學古天青對基督新教饒有興趣，經向他宣傳教理後，於1828年1月由梁發為之舉行洗禮入教。後又到澳門傳教，一方面，教授兒童學習《聖經》，另一方面努力撰寫《勸世良言》一書等十二種宣教小叢書。

1830年，在梁發的教育和影響下，跟梁發做過多年印刷工作的屈亞昂在澳門馬禮遜家中受洗入教。之後，梁發和屈亞昂於1830年5月28日到7月14日，同到高州傳播基督新教。此時他寫好《真道尋源》、《靈魂篇》、《異端論》，並刻印好裝入箱中帶去高州散發，史稱：

他們到高州去，其目的是要把基督教書籍分派與由各縣來城的童生。他們在沿途經過的墟市中派送佈道小書。在高州的一個城中，他們已經派送了七百多本，大部分是送給來城投考的童生們的。⁽³⁾

1830年，梁發和屈亞昂從高州回廣州，到一家姓林的旅館住宿，又向林老闆及一個泥水匠住客李新宣傳教義，深受啟發後於1831年二月由梁發施洗入教。同年，又為他的父親梁冲能和他兩個兒子施洗入教。

1834年，馬禮遜死後，梁發越發抓緊時間進行傳教活動。此年，他利用廣東舉行三年一次的鄉試機會，向全省各縣來廣州投考的秀才們散發《聖經》等書刊，廣為宣教基督新教。他在日記中記述：

三四年以來，我常在廣州城附近鄉村及其它各地派送《聖經》日課，人人皆喜歡接受，拒絕不受者人數卻甚少也。今年適為三年一次之鄉試。各縣秀才皆齊集省城應試，於是我遂想從速將佈道小書派送於彼等。因此，八月二十日，我遂約同吳亞清(以下人名皆譯名)、周亞生及梁亞新將書籍攜往派送。是日共派出《聖經》日課一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喜歡接受，並無任何滋擾；我儕皆甚為快慰。翌日又同樣派送一千份，亦並無事情發生。⁽⁴⁾

但梁發在廣州派送《聖經》給鄉試秀才終於被清朝廣州知府發現，並於第四天派巡卒前來拘捕梁發等，結果吳亞清、周亞生被捕，梁發逃回

高明，帶妻女逃至江門和開平赤坎躲避，然後轉到澳門向裨治文籌集800圓錢，託人回廣州營救吳、周兩人出獄。

1835-1838年，梁發在麻六甲、新加坡努力傳教，中間祇回國一次。其間他曾於1837年寫了《鴉片速改文》一書，勸人戒除吸食鴉片的惡習。

1839年，梁發回到廣州，9月間遇鴉片戰爭，至1842年8月才告結束，其間梁發在廣州和附近各地進行傳教。他兒子進德被林則徐聘為英文譯員。1839年馬禮遜長女婿合信（Dr. Hobson）由倫敦會派來廣州。梁發與他合作，親密無間，直到1853年梁發去世為止。1841年9月，梁發往澳門訪謁倫敦會的教士維魏林（Lockhart）、合信醫生，並寫了一本《赦世之禮論》小書和將麥都思的《新約》譯本修改，並為他的寡居小姨子施洗入教。1842年，梁發母親由伯駕旋洗入教。此時，梁發決定遷居廣州河南龍尾導村居住。

1843年梁發從廣州到香港傳教，在何福堂的幫助下，創設許多宣教機構。但因他父親於1844年2月20日病亡，他祇好又回廣州。他兒子隨他回廣州後，受聘於某鉅賈當翻譯員，從此不再協助父親做傳教工作。到了1844年中美簽訂《望廈條約》時，進德作著英翻譯參與訂約之事。因為條約中有一條是准許外國人在通商口岸設立基督新教教會和醫院，於是道光皇帝正式寬容了基督新教的傳教。這樣一來，梁發利用這一機遇，於1845年，在博濟醫院舉辦禮拜聚會進行傳教，這種聚會延續三年半之久，先後參加聚會的聽眾共計1,500多人。⁽⁵⁾

1846-1847年，梁發又在河南他家附近的一間福音堂舉辦禮拜聚會，聽眾達130多人，分送小書218本，並為四個婦女施洗入教。

1848年，梁發又利用來伯駕開設的醫院看病的機會，向眾病人宣教。是年，梁發妻子因病去世。

1849年，是廣州傳教工作十分興旺一年，當時在廣州居住的傳教士達十四人。梁發雖然年逾六十四歲，但一樣熱心宣教，並為從東莞來廣州的青年周學施洗入教。周學成為梁氏得力助手。

1855年，英國衛斯理會派第一批傳教士來廣州，梁發亦與他們合作傳教。但時梁發已老病在身，於4月12日3時去世。此年，很多人深受梁發宣教影響受洗入教者達十五人之多。

梁發去世後，殯葬於廣州河南龍尾導與康樂村間的小山上，與他父親、妻子的墓地一起。五十年之後的1905年，嶺南大學從澳門遷至廣州河南康樂村。學校為擴充校園，把附近許多墓地購入，發給墳主以遷葬費，叫他們將墳中遺骸遷往別處埋葬。1915年10月18日梁發的兒子澤蘭死後不久，嶺南大學副監督鍾榮光接到馬來西亞聯邦美以會宣教士馮炎公先生的一封來信，說其妻子是梁發的曾孫女，又說梁發的墳墓在該校所購買的墳地中。1918年，宣教士夏令會在嶺南大學開會，鍾榮光借此機會帶宣教士到鳳凰岡參觀梁發及其父親和妻子的墓地。嶺南大學當局把梁發遺骸葬於校的中央禮拜堂前地。1920年6月7日，該校舉行紀念會，將梁發葬地劃為尊崇之地，請梁發的曾孫女婿馮炎公演講。

基督新教傳入廣東後，雖然馬禮遜等傳教士在梁發終生努力幫助下開展傳教活動，但由於當時是清政府禁教時期，加上澳門耶穌會又禁止天主教徒與基督新教徒來往聯繫，因此基督新教發展並不快。到梁發去世時的1855年，廣東真正受洗入教者僅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姓名者是蔡高、梁發、蔡盧興、蔡亞生、梁進德、黎氏（梁發妻）、古天青、屈亞昂、梁冲能（梁發父）、何福堂、周學、林某、劉蔗泉、李新、劉澤春、朱阿山、阿凱（Akai）、吳阿昌（Woo Achang）、梁阿壽（Leang Ataow）、梁阿蓀（Leang Asun）、朱靖（Choo Tsing）。而這些信徒中除梁發親屬以及幾位與梁發關係密切者，其他人均不太集中精力傳教。⁽⁶⁾直到1900年，廣州也僅有基督新徒5,000人。

在廣東的思想文化效應

如上述，儘管馬禮遜和梁發等教士傳播基督新教發展不快和教徒不多，但他們通過傳教給廣

東以至中國的思想文化影響卻是相當大而深遠的。

第一，激發洪秀全掀起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這也許是梁發傳播基督新教在思想上最大的效應。如前述，梁發於1834年向在廣州參加鄉試的秀才們派送二千份《聖經》時，落榜的花縣童生洪秀全拿了一份回家，至1837年再次赴考落榜後，他認真研讀了《聖經》和梁發於1832年所寫的《勸世良言》，找到追求平等的鎖匙。特別是1842年，他與羅孝全傳教士同住兩個月“學道”後，深受影響，然後與亦受《勸世良言》影響的馮雲山組織拜上帝會，採用梁發用文字佈道的方法佈道，宣傳反對崇拜偶像和清朝政府，從而組織隊伍掀起一場反對清朝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從廣西金田村起義向北打到天津南下至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政權。關於太平天國的研究和發掘資料，國內外專家已有大量論著，而且已深入人心，在此不必多論了。⁽⁷⁾

第二，推動廣東近代新式學校教育的興起。

基督新教傳教士為了提高傳教效率，大力通過創辦歐洲近代學校來輔助傳教開展。開始時由教會獨立創辦小學、中學、女子學校、醫學校、師範學校，進而創辦大學等。這是基督新教傳教士非常重視的一項文化活動。先是由馬禮遜籌辦、米憐任第一任校長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於1818年在麻六甲創辦，梁發、屈亞昂、何福堂、梁進德均在該院經受教育。以後，傳教士就按此書院的經驗，在澳門、廣州辦學。

1834年8月馬禮遜逝世後，他在廣州和澳門的朋友，即成立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1835年1月募款4,860圓，於1839年11月4日由耶魯大學畢業生、曾任職紐約聾啞學校的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夫婦在澳門正式開辦馬禮遜教育會學校(簡稱馬禮遜學校)。⁽⁸⁾第一年招收學生六名，1840年3月又招收五名，組成一個班，稱第一班。香山縣(今中山市)的容閱、黃寬、黃勝，就是入馬禮遜學校的學生。1841年10月29日，又招學生十二名，編為第二班。1843年4月再招收十二名學生編為第三班，1844年招收

十名編為第四班。此後不再成批招生，至1850年停辦。馬禮遜學校採取中英雙語教學，為了學生將來在中國謀生，校長布朗把學生上課學習時間分為“半日中文，半日英文”，一般是上午學中文，晚上學英文課程。⁽⁹⁾其學制為三至四年，課程有漢語、英語、算術、物理、化學、生理衛生、地理、音樂、美術等。漢語按中國傳統讀“四書五經”，並學習書法。所以馬禮遜學校是中西結合的教育。此算是在中國本土第一個以基督新教團體為背景，以普通初、中等教育為內容的學校，標誌着中國近代教育的開端。1847年1月4日，布朗夫婦回國，他表示願意帶幾名學生去美國繼續深造，第一班學生容閱、黃寬、黃勝三人自願前往美國讀書，4月12日到達紐約。容閱進入麻塞諸塞州讀中學畢業，後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畢業；學成回國後，成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企業家。更可貴的是，他還到南京謁見太平天國洪秀全之侄洪仁玕，提出要建立軍事學校培養優秀軍事人材和建設海軍的建議。黃寬則於1849年高中畢業後考取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受倫敦會作為傳教醫生於1857年派回廣州，長期在金利埠醫院(惠愛醫院，後來的博濟醫院)當醫生，是為中國第一個西醫生。⁽¹⁰⁾

與此同時，郭實臘夫人和叔未士夫人也在澳門創辦學塾，做馬禮遜學校招學生讀書。

到了1884年，美國長老會的哈巴(Happer)牧師在美國籌款來廣州金利埠(今六二三路)租屋創辦格致書院，1888年正式開學上課，第一班招學生十多人。1893年，格致書院董事局經紐約州立大學批准成為該校的附屬學校，按該校課程上課，畢業後可領紐約州立大學畢業證書。1900年遷校澳門，並改名為嶺南學堂。1904年嶺南學堂遷回廣州康樂村，成為基督新教在廣州創立的高等學校。1927年國人收回自辦，易名為嶺南大學，孫科任董事會董事長，鍾榮光為第一任華人校長，第二任校長是李應林，第三任是陳序經。

基督新教傳教士和教會在廣州還創辦近代式的中學，如1872年夏禮牧師的妹妹夏理女士創辦



《勸世良言》圖

真光女子中學；1882年，美國長老會夏禮牧師創辦培英中學；南美浸信會美容懿女士在五仙門創辦培道女子中學，1888年信義會創辦中德中學；1909年英國聖公會創辦對聖三一中學；同年碧盧夫人創辦協和女子中學，後加拿大長老會加入改名為協和女子中學。同時，傳教會在廣州創

辦十多間小學。這些中小學均按西方近代學校課程進行教學，但也安排有關中國傳統文化課程，如四書五經、歷史等。基督新教教會在廣州創辦大中小學，其目的當然是為了傳教，但在客觀上卻把廣東教育的近代化進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其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

與此同時，基督新教的教會和教士也在廣州、澳門等地創辦了一些醫學的專門學校，培養醫務人材（詳後）。

第三，加速廣東建立近代西醫藥學體系。

以辦醫院救治病人從而進行傳教，這是基督新教的一種方法，稱之為“醫務傳道”（Medical Mission）。最早來澳門和廣州以開醫院進行傳教的英國著名醫生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先於1827年將在澳門開設的一所眼科醫院遷來廣州另立診所，名曰廣州診所（Canton Dispensary），這是西醫院在廣州創辦之始。1836年，他向教會呈遞〈關於任用醫生作為對華傳教商榷書〉（*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呼籲和請求教會多派學醫的傳教士來華，以醫療方式輔助傳教。他的呼籲得到各國教會的重視，不斷派出傳教士醫生來廣州開辦醫院，行醫傳教。

1853年12月26日，美國傳教士醫生伯駕（Peter Parker）受美國公理會國外差會派遣來到廣州，在新豆欄街豐泰行3號租用一幢中國商人的房子，於11月4日開辦了眼科醫局（Ophthalmic Hospital），亦稱“新豆欄醫局”，內設有接待室、診斷室、配藥室、手術室和觀察室，能容納二百名病人候診，規模相當大。“醫局開業第一天沒有人敢來求醫，第二天祇有一個患青光眼的婦女單獨來到診療。”第三天情況開始好轉。以後便源源不斷地有病人光臨，到第一季度末，就接待治療女病人二百七十人，男病人六百五十五人。⁽¹¹⁾由於伯駕免費接收貧窮病人治療和其醫術高明，使醫局就診病人日益增加，地方也不敷使用。次年春天，得怡和行商伍紹榮幫助，將豐泰行7號免費借給伯駕擴充醫院場所。經擴充的醫院，醫務相當繁忙，據說每天清早從四面八方擁來的車馬轎子與官員、侍從、馬夫、轎夫等，將街道擠得水泄不通，來求醫者千百計。據統計，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來醫院診病者達到2,152人次。計診治眼病者四十七例，其他病者二十三

例，並有數例女性癌症者。伯駕曾親自記述過這間醫院診病的繁忙情況：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燈，在清晨二三點鐘就從家裡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張掛號票。⁽¹²⁾

為了應付眾多的病人治療，伯駕僱傭廣州人當助手，幫助其配藥、護理及翻譯，並運用流水作業法，提高醫院的醫療工作效率。祇是到了1855年，伯駕出任美國駐華公使後，才停止了她的醫療工作。醫院亦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焚於戰火。1848年，英國傳教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在廣州金利埠（今六二三路）開辦惠愛醫局。

1859年，來廣州的美國傳教士醫生嘉約翰（John Glasgow），重新組建並修葺被火燒的仁濟醫院重新開張，改名為博濟醫院（今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在嘉約翰的主持下，依靠廣州青年醫務人員合作，醫院成績斐然，聲望日高，成為中國近代醫學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西醫院。在博濟醫院工作的一些外國傳教士醫生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相繼到佛山、肇慶、陽江等地開創西醫治療事業。而另一些傳教士醫生在廣州又創立新的西醫院。如1894年，經嘉約翰多方努力，得到親友和教會的幫助，在廣州下芳村購買土地十七畝，創辦惠愛醫院（今廣州市芳村廣州精神病院的前身）。此為中國首家西醫精神病院。從此，廣州以及中國的精神病患者從數千年的巫術、符咒的迷霧桎梏中解脫出來，接受科學的醫術治療。1899年，美國傳教士女醫生富馬利（Fumarri）來廣州，在西關開辦道濟醫院，後因“道濟”二字與廣州話“刀仔”有諧音之嫌，接受中國駐美公使梁誠的建議改為柔濟醫院（今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1901年，兩廣浸信會在廣州南關開設宏濟醫院（後改為兩廣浸信會醫院，遷至東山）。1903年，法國教會派醫生在廣州長堤開辦中法韜美醫

院。至此，基督新教傳教士醫生在廣州開辦的西醫院達五所之多。

基督新教醫生傳教士還把西醫術傳入廣州，這方面伯駕開了先河。1835年，伯駕在其開辦的“新豆欄醫局”（眼科醫局）給一位白內障眼病患者做切除手術，同時為其他人切除膿腫、腫瘤等項手術。伯駕曾經仔細地記述他做的一例手術的情形：

病例第446號。12月27日，何齊，女，13歲，肉瘤。

當時我正打算下班，看見一位中國人牽着他的女兒，遲遲疑疑地走進醫院門。乍一看去，他的女兒像長了兩個腦袋，太陽穴上隆起一個巨大肉包，一直重掛到下頷，一張臉悲慘地變了形。⁽¹³⁾

伯駕讓病女孩的家長在手術單上簽名畫押後，為病孩做了切除手術，僅用8分鐘就取出了一個直徑16寸、重1.25磅的巨型內瘤，再經18天的治療便康復出院。由於伯駕開刀醫術精湛，無數病患者均很樂意動手術以消除惡疾。如有一位六十五歲的婦女患有雙眼白內障病，當伯駕要為她施行切除手術時，問她是否害怕時，她居然回答：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雙眼取出，再裝進去。⁽¹⁴⁾

伯駕終於為這位婦女動了切除手術，醫好她的白內障眼疾。至1836年，伯駕每週還專門安排一天時間全天為病人動手術，而且手術的範圍更廣，包括白內障、截肢、乳腺癌、肉瘤、臉肉翻、臉下垂等。據統計，他親自施行的手術達到1,284人次。

伯駕和約翰在廣州博濟醫院做外科手術時，也成功地傳入麻醉法。1847年，伯駕第一次使用乙醚麻醉法，他曾詳細地記述這種麻醉法動手術的情況：

我聽到使用硫醚麻醉成功的新辦法時，使用一位好友給我的一架石製切除手術儀器，替一位三十五歲左右臂部生有脂瘤的中國人使用麻醉後手術，（……）吸入蒸汽三分鐘後，病人還能清楚回答醫生的問題，同時瘤被很快地割了下來，（……）病人說他知道是在做手術，但感覺不到刀和針（……）⁽¹⁵⁾

1848年，又成功使用氯仿麻醉劑施行手術。醚麻醉醫術是美國醫生傑克遜（Dr. Jackson）和莫頓（Dr. Morton）發明，並於1846的10月16日在波士頓諸塞綜合醫院內應用的首例外科手術成功。伯駕於1847年就在廣州做手術時應用這種麻醉法，距傑克遜和莫頓的發明不到一年時間，說明西醫術在廣州以至中國的傳播與世界先進醫學醫術的發展是同步的。

隨着上述西醫院的開辦和擴展，以及西醫術的廣泛應用，英、美等國家的傳教士醫生深深感到人手短缺的困惑。特別是伯駕在廣州開辦眼科醫局後，十分迫切需要培養助手來幫助他開展醫務，他說：

如果有幾位受過良好教育、急切希望掌握西醫藥、同時打算全面學習的青年，能經常來醫院服務，這對醫院工作效率來說，則是非常有益的。⁽¹⁶⁾

於是，伯駕在1837年在博濟醫院內設立一個醫療班，招收三名廣東青年學生進行培養。此可說是西醫學校在中國創立之始。伯駕用英語給他們講些基礎理論，主要是教學生進行實際的手術操作訓練。其中佼佼者為關韜。在伯駕的培養和指導下，關韜學會了白內障、臉內翻、翼狀胬肉、腹腔放液穿刺等外科手術，並能作腫瘤切除、拔牙、接骨等治療，成為一名優秀的眼科和外科醫生。鴉片戰爭期間，伯駕回國，博濟醫院的醫療事務便由關韜主持。1856年，中英戰爭期

間，關韜被清政府派遣到福建的清軍服役，任“五品頂戴軍醫”，成為中國第一個西式軍醫。

1866年，嘉約翰在博濟醫院內創辦南華醫學堂，後改名為博濟醫校。此是中國第一所正式的西醫學校。主要招收惠愛醫局的學生，也招收少數開業的中醫生。1868年招收學生十二人，1870年又增收數名。每週二、六上課兩次，學制三年。嘉約翰親自講授藥物學和化學兩門課程，聘請留英學生、惠愛醫院的黃寬醫生講授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課程。至1879年，此校改名為“南華醫校”，同時開始招收女學生。1886年，孫中山進入此校肄業。1897年在校學生達到三十一人。這所醫校至1912年停辦，共培養了150名畢業生。他們大多數在廣州和廣東省內各地從事西醫業務，也有少數進入西醫學校擔任教師，對於華南和全國的西醫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1902年，富馬利(Fumari)在廣州西關創辦廣東女醫學堂(1905年改名為夏葛女醫學堂)，富馬利親任校長，至1920年，共培養畢業生160多人，分佈到全國十三個省以至英、美、法、印尼、新加坡、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從事醫務工作和擔任教職。

1903年，美人端拿氏在廣州創辦廣州柔濟女醫院端拿看護學堂(後改名為廣州端拿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專門培養醫院的高級護士人材。

此外，基督新教傳教士還達將西醫學理論傳入廣州。在這方面，合信開了先河。他在廣州主持惠愛醫局的治療和教學過程中，對中國的疾病進行調查，並考究中醫理論和中醫藥治療手段，從中發現“中土醫書所載骨肉臟腑經絡多不知其體用”、“不知病源”⁽¹⁷⁾的缺憾，於是他在南海縣人陳修堂和江寧人管茂材的幫助下，於1851年開始翻譯介紹西醫基礎理論和臨床治療經驗的醫學著作，向中國介紹西醫學各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他所翻譯的西醫書籍有：

1)《全體新論》(*An 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 Canton, 1850)；2)《博物新編》。3)《西醫略論》(*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 Shanghai, 1857)；4)《婦嬰新說》(*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 Shanghai, 1858)；5)《內科新說》(*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Shanghai, 1858)；6)《醫學新語》(*Medical Vocabulary*, Shanghai, 1858)。

合信的前五本書被稱為《西醫五種》和《西學新語》，是19世紀中國第一套漢譯的醫學書籍，它在廣州和上海出版並以漢學的形式向中醫師和中國知識界乃至中國社會各界推薦了西醫科學，引起廣州和中國醫學界知知識界極大的興趣，幾年之內再版多次。特別是《全體新論》一書出版後，由於它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和圖文並茂，概述了西醫體系人體生理的結構和功能的解析，並從骨科學開始，比較各種動物的骨骼、肌肉、韌帶、腦髓、骨髓和神經系統，論及各種感覺器官以及低等動物器官的各種適應性，又用多側面的示意圖說明人體和動物的生理功能，如“眾血動行圖”、“入肝化生膽汁圖”、“心血運行圖”、“小腸吸液管運行圖”等，使讀者一目了然，於是，“遠近翕然稱之，購者不憚價”，很快就在全國各地以至日本不脛而走。幾年內再版數次，連為官者的兩廣總督葉名琛也十分喜歡此書，撰文贊揚曰：

泰西合信氏著《全體新論》，繪圖最為詳明，首列全體，次列各體，計圖二百七十有一。粵東金利埠惠愛醫局有石刻本。余因按原式分刻八幅列之坐右，以便省覽，且資持贈。欲究心醫理者，曉然於內外隱顯之本源，實足為望、聞、問、切之補助云爾。繫以贊曰：

萬靈備具細驗全身，中邊分析表裡詳陳；

由形識性似妄實真，圖稱創見術遜仁人。⁽¹⁸⁾

可以說，合信的西醫文獻翻譯對中國傳播西醫科學理論方面，厥功甚偉，筆路藍縷，殊為不易也。

在廣州主持博濟醫院和博濟醫校時間最長的嘉約翰醫生，是翻譯西醫學書籍向廣東和中國傳播西醫理論最多的第一人。他自1859年開始翻譯，至1903年，共譯成中文的西醫書三十四種，其中最重要者計有：

《化學初級》4卷(*The Principles of Chemistry*, 1871)；《西藥略釋》4卷(*Manual of Materia Medica*, 1871)；《里紮新篇》1卷(*Essentials of Bandaging*, 1872)；《皮膚新篇》1卷(*Manual of Cutaneous Diseases*, 1874)；《內科闡微》1卷(*Manual of Symptomatology*, 1874)；《花柳指迷》1卷(*Treatise of Syphilis*, 1875)；《眼科撮要》1卷(*Manual of Eye Diseases*, 1880)；《割症全書》7卷(*Manual of Operative Surgery*, 1881)；《炎症》1卷(*Treatise of Inflammation*, 1881)；《熱症》1卷(*Treatise of Fevers*, 1881)；《衛生要旨》1卷(*Treatise of Hygiene*, 1883)；《內科全書》6卷(*Manu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1883)；《體用十章》4卷(*Manual of Physiology*, HuXley and Yonman's 1884)。

嘉約翰翻譯這一系列西醫書籍是作為博濟醫校的教科書出版的，重點是集中在臨床醫療技術的傳播，而且注重於廣州和廣東其它地區常見的流行疾病如眼科、皮膚科等醫療技術，目的是為博濟醫院培養醫生。

在嘉約翰翻譯西醫學書籍行動的感召下，在廣州博濟醫院任助理醫師的中國人尹端模，也加入了翻譯西醫學書的行列，截至1894年，他共譯成《體質窮源》1卷、《醫理略述》二卷、《病理撮要》二卷、《兒科撮要》二卷、《胎產舉要》二卷共五種，成為參加西醫學文獻翻譯的中國醫生，為西醫學理論在廣州和廣東以至中國各地的傳播作出了貢獻。

為了及時將西方國家的最新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及時介紹到廣州和中國內地，嘉約翰於1880年創辦中國第一種西醫學期刊雜誌《西醫新報》，自任主編，由廣州博濟醫局出版發行，每年出版四期。當時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對《西醫新報》的形式、內容作了詳細的介紹：

此係一種醫學雜誌，專為華人而設。報紙共八頁，大號雜誌格式，有封面及目錄，全屬中文。在發刊辭中，用簡潔文言，說明雜誌之益，醫志尤其為需要，並述西醫比較中醫之優越。第一號有短論文十四篇如下：(一)論醫院；(二)中國行醫傳道會；(三)內科新說；(四)方便醫院之情況；(五)燙傷之治法；(六)真假金雞納霜；(七)初起之眼炎；(八)大腿截除術；(九)上臂截除術；(十)內瘤奇症略述；(十一)論血瘤；(十二)癲狂之治法；(十三)論內痔；(十四)論外痔。⁽¹⁹⁾

可惜此雜誌出到第8期就停刊了。到1886年，嘉約翰的助手尹端模創辦了《醫學報》月刊，仍在廣州博濟醫局出版發行，但僅出數期即停刊。此是華人自辦的第一本醫學雜誌，對於報導西醫學的知識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促進廣東近代新聞出版事業的發展。

基督新教傳教士十分重視以出版書籍、報刊進行傳教。自馬禮遜始，就請蔡高、梁發刻印《聖經》等書，向澳門、廣州等地的人群派送、宣教。後來馬禮遜、米憐等又把《聖經》、《新約》、《舊約》等翻譯為中文刻印，據統計，1810-1819年，共印行《新約》單行本7170冊，《舊約》單行本2909冊，兩者合計共10,079冊。⁽²⁰⁾

1830年5月1日，裨治文在廣州創辦和主編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雜誌，每月出版一號，共辦了二十年，至1851年才停辦。開始時每號(期)印行200份，1834年增至800份，其宗旨是“喚起人們對於其億萬民眾的精神和社會福祉的興趣，來傳播有關中國的知識”⁽²¹⁾。與此同時，還辦了一些英文刊物，如《福音雜誌》(*Evangelical Magazine*)、《傳教先驅》(*Missionary Herald*)、《浸會傳教雜誌》(*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中國傳教呼聲》(*China Mission Advocate*)和《中日叢報》(*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教條雜誌》(*The Chinese Record*)等。

1832年，梁發撰寫的《勸世良言》(由九種傳道書組編成的一部書)印刷發行。1843-1844年，美部會印行的傳道書共四十八種、十五萬冊。同時，有些教士還通過利用辦出版雜誌宣教。1833年，8月1日由郭士立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月刊出版發行，第一期印發六百份，馬上銷售一空。1835年印行一千份⁽²²⁾。此份雜誌影響很大，被運往南京、北京等城市散發。1834年11月29日，由英美傳教士和商人成立“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亦可譯作“中國益知會”)，其宗旨就是刊行中文書籍，推廣科學和實用知識，開啟人們思想。1835年，裨治文又提出印刷《世界通史》、《世界地理》和《世界地圖》等書籍。

1841年，由裨治文以中英雙語編著的《廣州方言中文文選》(*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在澳門出版發行，全書共十七章，“向歐洲人提供與中國人進行個人交往的工具，並在中國人中傳播英語知識”⁽²³⁾的雙重目的，影響很廣。

鴉片戰爭後，教會出版介紹西方實用知識的書籍報刊也隨之增多，出現了專門的教會書店。如長老會在雙門底(今北京路)辦的聖教書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98年湛羅弼牧師在沙面開辦的廣州美華書局。1902年，該書局創辦了《真光雜誌》，在教內外有一定影響。該書局又在仁濟路建五層大樓名日光樓，其樓下設立南華基督圖書館。據統計，書局在廣州時出版物逾一百種，銷售書籍達十萬冊。另外，各教會團體和教堂還先後不定期地出版宗教月刊，較為有影響的有東山浸信會(Baptist Convention)的《朝曦》月刊、長老傳道會的《自理》月刊、仁濟堂的《仁濟》月刊等，促進了廣東出版圖書事業的發展。

以上這些書籍雜誌的印行對廣東近代出版事業的興起是起了重要促進作用。

此外，傳教士在廣州還創辦明心書院(瞽目學校)、暮光瞽目院，兩廣浸信孤兒院等慈善事業機

構，對於廣東近代社會保障等慈善事的興起也是起了推動作用的。

【註】

- (1) 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頁74-76，澳門基金會1994年版。
- (2) 麥沾恩：〈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載《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2期。
- (3) (4) (5) C. H. McNeur, *Life of Leung Faat, With "Good Words Exhorting Mankind" by Leang Faat*,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1959, pp. 42-43; p. 68; p. 97.
- (6) 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p. 294-300;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Morrison*, Vol. II, p. 472.
- (7) 國內專家的近期研究成果可參閱王慶成：〈洪秀全與羅孝全的早期關係〉，載《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國外研究羅孝全與洪秀全關係的研究成果可參閱：George Blackburn Pruder, *Issachar Jaca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p. 156-160.
- (8)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uni ssions for Foreign Missons in China*, p.16; p. 9.
- (9) E. C. Bridgman, "Fifth Annual Report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include List of Students)",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p. 569。但容閱在其著《西學東漸記》一書回憶，則說：“英文教課列在上午，國文教書則在下午。”
- (10) 容閱：《西學東漸記》頁49-51、頁56-57。
- (11)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Medical Missonary Society in China", 1841.
- (12) 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Shanghai, 1935.
- (13) 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Shanghai, p. 42, 1935.
- (14) *Repert of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etc*, Macao, 1843.
- (15) 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Shanghai, p. 76, 1935.
- (1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 p. 32.
- (17) 合信：〈全體新論·序〉，江蘇上海黑海書館藏，咸丰六年(1851)刻本。
- (18) 引馬伯英等：《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頁375，文匯出版社1993年版。
- (19) *China Review*, (9) 2:7, 1880.
- (20) 根据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ortestant Misson to China*, pp. 267-268 表格數字統計。
- (21) *The Life and Labor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 74.
- (2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First report of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 (2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p. 404.